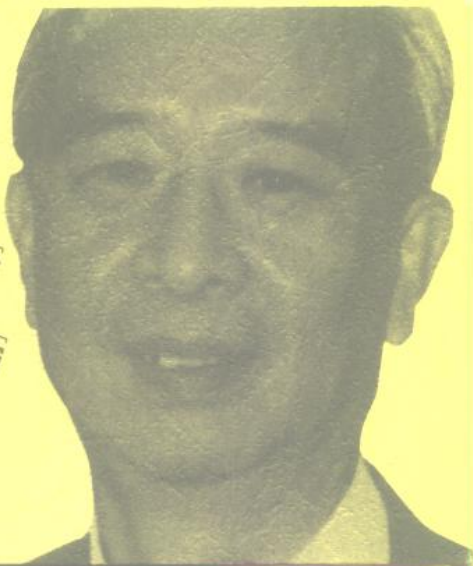


汤一介

● 汤一介 著

纪 术 笔
世 学 随
十 国 化 大
二 中 文

学
术
文
化
随



汤一介
学术文化
随笔

- 「论利玛窦「现代」与「后现代」」
- 「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西文化的尝试」
- 「论儒家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 「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 「西学观念与设计思想——从第四产业说起」
- 「中国文化——从第四产业说起」
-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
- 「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三三

国防大学 2 063 0633 5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汤一介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 汤一介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汤一介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7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ISBN 7-5006-2244-9

I. 汤… II. 汤… III. 汤一介—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1545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0.25 印张 2 插页 205 千字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总序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

67E89/19

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故尔出现了新转型的学说——新儒家、新道家；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得以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开窗敞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莱、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意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学界究竟该接受谁？是全盘接受而搞非历史的横向移植——全盘西化（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还是部分接纳——半盘西化（温和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即只接受古希腊的民主、科学

精神，不要希伯莱的宗教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只接纳近代启蒙理性精神，不接受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呢？是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转型之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不仅讲求形而下，关注事实世界领域，而且讲求形而上，关注价值世界问题呢？甚或，像当代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家那样，只要所谓“新”的反理性、反理想、反启蒙、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要现代性或民主、科学、真理、启蒙、公正，而走向经济消费主义和生命玩世主义（当代虚无主义）呢？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失落，是终极关怀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

就学术文化史而言，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而且，在世纪末，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东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

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时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今天，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寻绎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不是要使真理、正义、理性、启蒙让位于语言游戏和价值虚无，而是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文化无国界。东方深厚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人类的明天仍有滋养作用。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

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去照澈幽味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回首二十世纪，一代代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世纪立言，为中国文化立心。学者们殚思竭虑，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审视，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对比；或关注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对中国原典进行现代阐释；或注意中国文化中的学统、道统、政统关系，期望在道德理想主义中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关注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致力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汇合；或身处“政治与学术之间”，从事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学术研究；或以高人逸士的风范，吞吐中西的胸襟洞察心性灵魂而独出机杼写出诗性感悟；或独标“散步哲学”，在“流云”般的自由思想中寻求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哲人们以本真生命为底色，以人类面临的世纪灾难为基点，为这千纪年的世纪末转换发出新世纪的“天问”——问向天人之际，问向古今之变，问向灵肉之间。

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的学者

以其超迈的胸襟和翼翼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申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编选这套百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旨在立足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审视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历程，并进而展望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景。“大系”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一”主要选编业已去世的现代思想学术大师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示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体验、理解、反思；“系列二”选编当代著名学者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现当代学者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反思、研究、探索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大系”分五辑（每辑二十卷），五年内出齐。严谨的思想体系、求实的学术品格、素朴的编辑作风是我们编选这套大型丛书的追求。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原作风格及其时代感，作品的行文造句、用词用字基本保持原貌。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念，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有其处身时代的思想烙印。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重读”、“重释”这些作品的意义。

愿这套丛书在寻求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相遇。

是所望焉，谨序。

王岳川

一九九四年岁末于北京大学

总序/王岳川

第一编 传统哲学篇

- 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节选）/003
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节选）/013
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节选）/028
论儒家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节选）/050
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节选）/063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节选）/075

第二编 文化新编篇

- 论儒家的境界观（节选）/093
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103
“现代”与“后现代”/121
在有墙与无墙之间——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135
哲学观念与设计思想——从第四产业说起/144

第三编 宗教研究篇

- 文化的双向选择——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考察/159
论道教的产生和它的特点/168
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186

第四编 思想文化篇

刘劭《人物志》与魏晋玄学（节选）/207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231

第五编 书序考证篇

汤用彤《校点高僧传》序言/249

印顺《中国禅宗史》序/253

读《世说新语》札记/257

唐代功德使考/260

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267

第六编 评论访谈篇

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279

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285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295

中国文化——重振辉煌？/299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302

汤一介年谱简编/307

跋/310



第一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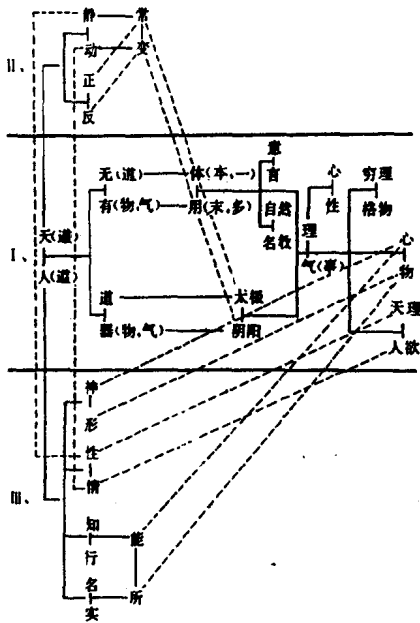
传统哲学篇

第一编 传统哲学篇

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
体系诸问题（节选）

“范畴”是从 category 翻译过来的，取“洪范九畴”的意思。从西方哲学史上看有种种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把它看作是存在的基本样式 (mode)，他提出十个范畴：本质 (substance)、量 (quantity)、质 (quality)、关系 (relation)、位置 (place)、时 (time)、占有 (state)、作用 (action)、遭受 (passion) 等。康德的 12 范畴说是与认识有关的原则或说是构成经验的条件。列宁说：“范畴是在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苏联《哲学辞典》说：“反映现实界各种现象和认识的最一般的和最本质的特性、方面和关系的基本概念。”看来，对“范畴”大体上是从事物的存在和认识两个方面来说明的：说它是“存在的基本样式”或“现实界各种现象的最一般的和最本质的特性、方面和关系，”是就存在方面说的；说它是“构成经验的条件”或“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是就认识方面说的。而认识的必要条件

必然是反映和表现“存在的基本样式”；而“存在的基本样式”又只是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才有意义。从上述一些说法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范畴”和“概念”的关系，范畴是基本概念，概念并不都是范畴。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的基本概念即范畴应有哪些。如果我们能根据中国古代哲学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构成一个能表现中国传统哲学是如何用以认识和说明“存在的基本样式”的体系，并能从中揭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那就证明中国传统哲学确有其范畴体系。下面先用一图表（见图）来表明，然后再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在这个图表中共用了 20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这当然是一个很初步的构想，问题一定很多，目的是想引起大家进一步地研究和讨论。对这个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构想图表，我想说明以下几点：

(1) 这个构想图表分为三大栏，第一栏（Ⅰ）是想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用了哪些基本概念表述世界的存在的；第二栏（Ⅱ）是想说明用了哪些基本概念表述存在形式的；第三栏（Ⅲ）是想说明用了哪些基本概念表述人的存在和认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中心，中国哲学史上的几乎所有大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子产第一个明确地提出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命题：“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一方面很重视“天命”，而另一方面更重视“人事”。他“五十而知天命”，却比较少讲这个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可是《论语》大量记载他讲“人道”的问题。孟子讲“尽性，知性，知天”，《中庸》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都是讲的“天人关系”问题。道家的老子讲“天道自然无为”，而压低“仁义”（人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汉朝的儒家大师董仲舒说他自己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受道家影响比较重的司马迁也说《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作。魏晋玄学讨论的“本末有无”问题，就其内容说仍是“自然”（天道）与“名教”（人道）的关系问题，所以何晏说：“若王霸者，始可与言天人之际。”宋儒无论理学还

是心学，都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称为“十六字心传”。朱熹认为“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之好的表德”，“天理”和“人欲”问题仍是天人关系问题。直到王夫之仍然把这个问题作为他讨论的重点，他认为“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是从讨论“天（道）”和“人（道）”这对范畴的关系而展开的，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问题和特殊内容。

(2) 这个构想图中表述了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发展的诸范畴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从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开始，而分为两支：一支为道家，老子提出“道”和“万物”的关系，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因此“道”和“物”的关系又以“无”和“有”这对概念表现；另一支是儒家，在《易传》中提出“道”和“器”这对范畴，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阴一阳谓之道”，所以“道”和“器”的关系又以“太极”和“阴阳”这对概念表现。两汉时哲学思想虽有发展，但似乎没有提出新的有影响的范畴。魏晋玄学主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而使道家系统的思想和儒家《周易》系统的思想渐结合，而实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而建立了关于宇宙本原问题的本体论。魏晋玄学用“体”“用”、“本”“末”、“一”“多”等概念说明“无”（本体）和“有”（万物，本体的种种